

设计大讲堂

倪建林 主编

青山见我

许平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设计大讲堂

倪建林 主编

青山见我

许平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山见我 / 许平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
(设计大讲堂)

ISBN 978-7-5624-4567-8

I. 青… II. 许… III. 艺术—设计—文集 IV. J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1947号

设计大讲堂

青山见我

许平 著

责任编辑:张菱芷 林传伟 版式设计:周 晓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25 字数:371千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4567-8 定价:3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写在前面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要写一篇好的文章往往并不比写一本专著轻松多少,这倒不是在篇幅或体量上的比较,而是就论题的典型性和观点的深刻性而言的。这就好像我们有时听一位专家教授的一次专题讲座比听其开设的某些长期课程还要来得有收获一样。就是因为单篇的论文或专题的讲座往往是浓缩了一位专家学者在某一方面研究的精华,言简意赅,直指问题的实质。

我们编辑这套《设计大讲堂》丛书,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窗口,将当代中国有影响、有成就的设计理论家们的思想精华,自选结集,奉献给有志于在这一学科领域进行思考的读者;所邀学者都是近三十年来中国设计理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思想曾经对中国当代设计界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也代表了当代中国设计艺术领域中思维的一个高度。人们常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愿这套丛书能成为设计艺术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阶梯。回顾走过的历程,应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变为继续研究的新起点,共同探求中国的设计之道和设计之法。

编 者

2008 年 10 月

自序

设计的天空

一场秋雨洗净北京上空的浮尘，天色透明而澄澈，远处的西山郁郁葱葱，把“神京右臂”特有的雄浑与雍容清晰地呈于天际。

承晓风兄与《装饰》杂志好意，8月13日，与品田、杭间等老友聚会香山右麓卧佛山庄，借商讨杭州会议之名，偷闲半日，暂避暑热。11月，《装饰》杂志社将与浙江工商大学在西湖杭州召开一次以“设计伦理与当代生活”为题的高校论坛，往西山而来的沿途景色为这次聚谈更添一层浓郁的色彩。

“北京的天空”一段时间以来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话题。8月8日，北京奥组委特邀数十家国际知名通讯社来京为“好运北京”测试赛进行赛事报道，同时为365天之后的北京奥运报道热身。然而，这批国际新闻大户来京之后最为关心的不是奥组委所希望的奥运场馆的气象或奥运志愿者的微笑，而是北京的污染、交通和食品安全三大热点。记得一家著名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北京时曾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北京的上空像“永远隔着一层玻璃”。相较之下，这话还是比较含蓄的。2005年冬，一批日本专家来校讲学时，其中一位就直言不讳地提出忠告，那年冬季弥漫整个北京挥散不去的黄雾，不是气象问题而是与上世纪初的伦敦十分相似的工业污染；治污工程将是21世纪北京和中国必须直面的最核心的挑战和最可观的国力消耗之一。

这两三年来，借奥运的契机，北京的污染、生态与城乡生活质量等问题，终于从水下浮上水面。如果说，历届奥运会都给举办国、举办城市带来关键性的发展契机，也许对于北京而言，进一步地关注城市生态与人的生存质量就是最有意义的重大突破。这是近年来甚至近几个月来，人们才切身体会到的。2007年全球气候变暖，由此也引发了整个中国境内百年未遇的极端性天气，各种旱、涝、风、鼠等灾害报道此伏彼起持续不断。平心而论，2007年的夏季北京还算“风调雨顺”，

雨水丰泽,微风送爽,气温略高但并未出现极端性异常,一场场雨水把整个春季的黄尘洗去,北京上空才恢复了久违的湛蓝。但北京的生活并未因此而轻松,食品安全、交通拥堵、医疗保障、生活指数上涨等民生问题接踵不断,由国际而蔓延至国内。严格来说,种种弊端并非只在此时此地的北京毕现,真正的变化是这些问题终于越过了水下“临界线”而成为公共的舆论焦点,百姓因此而焦灼,但也因此而带来了新的期望。北京的天空是否会从此而日益晴朗尚不得而知,但民望至此,舆论至此,国际关注至此,已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北京的幸事,中国的幸事。

发展社会学的理论认为,真正的社会发展,并非总是由某种发展的意志单方面能够决定,它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于发展认同的共识,只有在同一高度价值认可的水准上,由政府 and 公众在内的各个层面、各种资源、各种力量所达成的认知共同体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本体。对于设计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上述种种民生弊端,都与某种生活方式、产品系统的设计有关,全社会日益强大的改善生活品质的呼声,就是下一步“设计总动员”的号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当代设计在中国发展的实质性突破,只能出现在社会的设计需求与设计力量之间达成相互的价值认可,形成切实的认知共同体的状态之下,这是设计发生和发展的生态学规律所决定的。

设计的发展需要一片湛蓝的天空。

从原理上讲,“设计”贯穿于人类生活与生产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从远古的社会形态开始,只要有人的生活创造,必然有“设计”的萌芽状态蕴含其中,即使一把最原始的石斧、石锤,也包含着体质人类学和制度人类学的双重内涵,它既是个体的自然人进化也是群体的社会人进步的标志。但是,现代社会中的设计发展,却是一项需要更完整的社会文明支撑的系统工程。因为现代设计,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的人群构成与价值观基础上的设计服务,它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一个时代的“设计”都有着内涵和指向上的重大差别。举个例子来看,中国历史上不乏杰出的、伟大的空间设计,但那不是皇家宫苑就是私家庭院,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的设计始终是弱项,直到今天,“公共厕所”的设计仍然是中国城乡建设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中国古代也不乏优美、典雅的工艺意匠,但那不是皇家珍藏就是私人玩物,中国历史上没有为百姓生活准备诸如路灯、报亭、邮筒这些公共产品的传统。这种空白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公共产品生产和流通系统的缺乏,

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为公共生活服务的设计价值观的缺失。而对于现代设计而言,这是一种文化动因层面的关键缺项。正如文化学批判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最主要的标准不是其圣贤经典中的‘语录’,而恰恰是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起居饮食、日常器物。”^[1]现代设计的最重要品质就是为大众生活提供完善、合用的大众产品、公共产品,经过设计师精心设计与生产机构精心生产的这些产品,其完美品质与皇家专用或个人私藏应当具有同样的神圣性和典藏价值。但是,这样的设计价值观需要一种对于公众生活和公共空间尊重和推崇的理念来支持。中国文化从来不乏对于皇家文化的敬仰,也不乏对于文玩古物的赞叹,真正缺乏的,正是对于大众产品、公共产品文化创造(在历史上体现为民间性、在现代社会中体现为公共性)的关注和推崇。如果说在历史上它是受生产方式与市场流通的局限所致,但在现代生活中它却可能成为进入现代文明状态的某种障碍,同时也正是推进公共设计发展的障碍。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廉价产品品质差、品位低的现状,只注意到它生产流通方式与消费方式的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结构所造成的大众产品与公共物品生产体系所需的心理支撑的缺失,这也正是现代设计的品质标准和自律标准迟迟不能在中国落地的文化元素。

我以为,这种文化基因的缺乏,将导致中国现代设计成长中的某种“缺钙”,因此需要补课。这种补课,既体现在需要推动中国社会对于设计价值的整体认知,也体现在设计本身更自觉地致力于有益的价值创造与价值体现,而不仅仅是为商业资本服务。前不久,大连一位年轻的设计师苦心孤诣地推出为农民工设计的轻型节能建筑方案,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嘉奖,我想这正是一种双向互动、功在民生的设计“补课”。一旦这两个方向上的补课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形成发展社会学所谓的认知共同体、形成认可并欣赏“设计创造价值”的舆论基础与发展空间,中国设计就有可能真正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如前所述,中国的设计需要一片天空,但它是否足够开阔和湛蓝,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来努力开拓的。

成为这次会议主题的设计伦理问题,实质上正是对中国设计的生存空间进行文化审视和反思的课题。伦理学的本质是人与人的文化相处问题,而设计伦理学则是以此为基础的

[1] 雷颐. 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N]. 经济观察报, 2007-07-23(42).

“人—物—社会”三重关系的重构。设计伦理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但也可以“隐藏”在设计本体论及方法论的思考中,如月融水,如水得月,成为真正照亮设计行为的学科。因为在我看来,设计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关系的再造。一套实用而低耗的农民工建筑,意味着不同的人生境遇通过细心的设计关爱可以实现同等的人格尊严;一套带盲人识别标志的公用电话键盘,意味着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精微的设计呵护而得到整个社会空间的认可;一股民间流行的“汉服”热,意味着长期压抑的主体意识经由“草根设计”的创意而可能重新唤回生活中的文化自觉与自尊……诸如此类的每项设计,都可能导致一种持续影响的文化现实。因此,设计师必须考虑到影响所及,从而对设计行为有所约束和限定,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设计伦理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设计而言,它甚至是比审美更加基本的存在——设计伦理意味着设计行为的全部文化态度、立场和方法。尽管在社会实践中,伦理的要求决不止于如此简单的结论,但是对于我个人的思考而言,它代表着最基本的思维起点与实践前提。

本集文稿付梓之日,恰逢西山聚会,由此引起关于设计伦理问题的上述思考。事实上本集所选篇目,大都是近年中零星写成,这些年正是中国设计事业借创意经济热潮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引起各方关注的关键时期。回顾一下这些选题的产生,几乎都与设计的社会责任、文化贡献的思考有关,也许是无意中的巧合,也许是中国设计真正到了应该将社会性、公共性作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来思考的时代。本集题名《青山见我》,中国向来具有所谓“主体间性”思维的传统和文脉,从对象性的角度进行主体的价值反思,恰恰是一种更强的主体自觉的文化境界。

行文至此,想起了结构主义设计大师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的那句名言,“设计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态度和观点”。设计是一种关于关系、格局与影响力的思考,如果全部的设计创造力都以这样的方式造物、行事、宜人、净心,那么,设计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将真的不成为一种职业,而只是一种文化的存在。

是为序。

许 平

2008年初秋,记于京郊果岭里

目 录

- 1/青山见我
 - 关于“主体间性”与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法的讨论
- 14/以批评的名义
 - 设计理论短缺中的文化反思
- 25/一种新文化与经济可能的“假说”
- 32/中国设计问题的基本线索
 - 重读《陈之佛文集》
- 42/迎接即将展开的亚洲故事
- 45/2004: 中韩设计合作的蓝图
- 48/设计博弈中的困局
- 51/“老字号”之战
 - 中国传统商业资源的现代命运
- 56/设计: 游戏于人文之间
- 58/设计的现代性
- 68/创意城市与设计文化认同
 - 关于设计与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断想
- 78/关于设计“原创”
- 81/作为创意城市品牌的时尚设计
- 88/创意产业的中国崛起
- 92/“设计岛”与“明星制”
 - 创意产业时代的品牌运行机制
- 99/应当重视和加强设计创意行业在首都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战略地位
 - 关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的几点思考
- 105/尴尬的“创意”语境
 - 关于设计政策与政府作为的若干思考
- 113/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政策的必要性

- 123/文化创意产业格局下的工艺美术再思考
- 133/玩具生产与工业设计发展漫谈
- 148/重塑陶瓷大国的文化气象
- 152/天下有漆
——祝贺扬州漆器厂建厂 50 周年
- 156/典丽与祥瑞
——东方文化内涵与北京奥运符号设计
- 158/回“家”的精神
——写在“家：从传统到现代”设计大展开幕之际
- 162/髹饰生活
- 163/一个时代的无奈与无限
- 168/设计的民族与世界
——艺术设计三人谈
- 176/走向“第五空间”
- 179/中国设计与国际视野
- 185/探讨新视觉经验时代的设计与设计教育
- 193/《图形设计》前言
- 196/东方设计的文化解析
——在“2003 中英工业设计论坛”上的发言
- 200/剪纸艺术家张永寿百年诞辰感言
- 203/作为交叉融合学科的艺术设计及其实在性
- 213/中国房地产业发展之现状和未来
- 219/禅的图形与东方设计
- 229/后记

青山见我^[1]

——关于“主体间性”与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法的讨论

当下的创意经济在经济的开放性、原创性与文化主体性方面与中国经济社会和民族振兴的总体走向相匹配，同时，为找回设计文化主体意识创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我们面临着一个极好的发展可能，但是可能不是现实，恰恰是在把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会暴露被掩蔽在表象之中的缺项。这正是我们需要关注中国当代设计的理由。

当代中国设计正在融入一个全球概念、一个世界性的范畴。2006年末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颁奖仪式上，日本“G-DESIGN”设计奖审议长喜多俊之表达了对中国设计红星奖的高度期望，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友好与善良，更应当看成一种严峻的审视。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走向的巨大经济体，中国设计的品质将决定世界上绝大多数消费品的品质与能源消耗。

“在中国，将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牵动全球的焦点问题。

如果说，在21世纪之前的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东方国家还有西方工业现代化过程作为借鉴，那么今天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没有现成的经验。就如“创意产业”，被澳大利亚学者金·迈克定义为“后现代”的经济模式，它要解决的是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走上了“创意产业”之路，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依靠自己的文化创造力去开创新的途径与模式。中国有句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它表现了一种以中国人的智慧，敏感于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的能力。历史是个呈现的过程，真正推动历史的方法是发现可能性，是由对历史逻辑的阐释转为对历史事件的把握的转变中体现的主动性。

[1] 本文内容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研究生课程《设计研究方法论》中的一节，发表时略有修改。

—

中国唐代著名禅僧青原惟信留下一段神龙不见首尾的禅语,其中描述了参禅者的3个认识阶段。《五灯会元》卷十七: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体歇处,

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如何理解这段话,是本讲所要讨论的方法论内容之一。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山水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可以说,青原眼中的第一种状态,是认识的主体与对象之间没有建立关系的情形,第二种状态是从局部开始建立关系的情形,第三种状态则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体构建成互为主体的认知关系的情形。这里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方法论哲学。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现代哲学中相当流行的概念,但这并不等于它是当代才被人所运用的哲学智慧。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这种“互为主体”的哲学关系表现得十分丰富,这正是本讲所要关注的内容之一。我想把它引入设计方法论与价值观的范畴里来考察,把它作为思考亚洲设计价值观时所想探讨的一个课题。

二

现代设计本身并不是破坏性的,它是对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被破坏的文化关系的一种修补;但是,在它进入中国社会的一百年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在西方未曾有过的破坏。

一百年的时间,可以被看成一个非常单纯的历史单元:西方设计“楔入”中国的过程,使一个本来正在延续的生活过程中断。结果是导致造物传统出现强烈的“震荡效应”——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中,由于某种外力的进入而引起了超过应有规模与水平的激烈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设计的方法与价值取向被淡化、甚至被抹杀。

这种“楔入”过程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

其一,本来,设计只是随着西方强势文明“打包”带来的一件“行李”,但是由于设计对于生活的“干涉”性,因此造成了持续的、强烈的“文化震荡”。

其二,是复杂的楔入动机。因为这些动机来自两方面:来自西方的,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楔入;来自本土的,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楔入。

这两种不同的努力,动机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但在结果上却是一样的,就是重构了中国原有的生活文化与设计系统。

客观地说,现代设计对于中国设计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贡献在于三点:①科技,采用新技术的能力;②市场,整合市场资源的能力;③形态,突显形态结构与价值结构中的个性化趋势的能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所传入的西方“现代设计”基本上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早期概念,对于西方设计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所作的种种内涵的、价值观方面的调整并没有渠道引进,也没有引起国内足够的重视。

但是,还有另一个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中国设计曾经有过自己的逻辑与方法,它们被忘却了吗?

北京制玉艺人李博生有一件特别的作品——玉饰《乾坤在握》,是给法国总统希拉克特别设计的。它不仅是一件中法人民友谊的物证,一件通过普通中国公民、一位手工艺人之手完成的“活儿”,一件凝结着中国文化朴素、深邃与人性化魅力的信物,还体现了一种男人之间对于命运、人生与世界哲理的深刻“交谈”。这是用中国手工艺的语言、理念与手法完成的,能说在这件物品中没有设计吗?

实际上,中国的哲学思维总是与“物”“心”“意”“象”这样的范畴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物”,指涉及到一切身外的参照,因此在与人的联系方式方面,更能体现出中国哲学中整体性、人文性的特征(图1)。

我们不应该忘记:曾经存在过的中国设计同样是一个完整的、平和且自然的、分层的系统。所谓平和且自然,是指它是在历史的文脉和生活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的,没有语境的冲突,也没有更多的政治关联……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所谓“物”是:造物、开物、名物……“物”既有笼罩一切的泛自然的含义,也有一种半自然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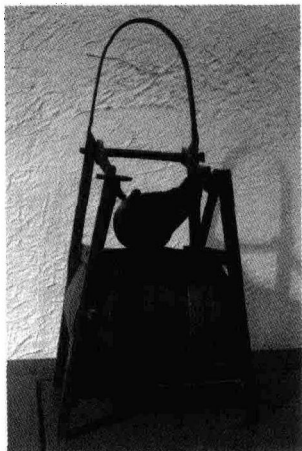


图1 江南油灯

的、兼具人工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属性,比如“万物”、“开物”,等等。

在专门的层面上,有所谓的“样式”、“花样”,是对某种独立的样态进行专门经营的,也有个相应的词,叫“件”。件是“分”的意思,“分”也就是“独立”,是“设计意识”独立的萌芽形式。

在高端的层面上,有所谓的“意匠”和“经营”,对针对具体的对象与题材而进行的构想与表达,有个词叫“作”。一般所关注的“作”,如“兵器作”、“水木作”,其实也指“工作”,玉器行有个职位叫“了作的”,相当于今天的设计总监。这个词非常值得注意。

在更高的、超越的层面上,是所谓“物我两忘”、“物通人性”、“互相为物”等,这个层次上称为“品”。所谓“绝品”、“神品”,强调的完全是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性的表现。

“物”、“件”、“作”、“品”这样的系统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着中国原有的一个平和、自然、与本土的文脉相匹配的朴素的设计秩序。

除此以外,中国设计还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宫廷体系类似于设计的制度中心;文人集团类似于设计的创意中心;宗教系统类似于设计的传播中心;民间阶层则类似于设计的生活原创与应用中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设计生态中的“宫廷”与“民间”的两极,如果说,民间是设计应用的“土壤”,宫廷则更像是制度性的“设计中心”。正像中国儒学中的道、学、政三个层面的传统一样,“政”不仅包含实践性的一面,还包含“制度性”的一面;自古以来的政府强势对于设计体系的形成、符号的提炼与推广、设计语境的形成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但是,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系统,由于20世纪前后的文化激变而被改变了。从整个近现代文明发展逻辑来看,“西风东进”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同时也是对正在延续的亚洲文化过程的突然楔入。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传统工艺教育与现代设计教育的关联性被强行切断,以构成教育为标志的设计教育一度成为教学中的主流,而传统工艺教育被边缘化了。迄今为止,绝大部分设计院校的教育方法与课程,基本都按照从包豪斯体系剥下来的西方现代设计理论的框架进行。西方设计理论建构于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人性一般被理解为理想的、抽象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般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支配与主宰的关

系。正是出于对这种“文化单边主义”的反抗与制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设计语言向本土文化回归的趋向。在我看来,这些中国元素、东方元素的出现,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回归,更本质的,是一种设计方法、设计思维的再发现。

现在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还能寻找出东方的设计思维与方法论吗?如果有,它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1970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ICSID(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为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工业设计,是一种根据产业状况以决定制作物品之适应特质的创造活动。适应物品特质,不单指物品的结构,而是兼顾使用者和生产者双方的观点,使抽象的概念系统化,完成统一而具体化的物品形象,意即着眼于根本的结构与机能间的相互关系,其根据工业生产的条件扩大了人类环境的局面。”

相比较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具体和有说明性的定义,但是读完以后,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设计在物与人的关系中是什么地位?谁给设计以干涉生活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如何实现的?物或者生活是完全由设计来支配的吗?设计能够合理地改变现实吗?设计的标准是唯一的吗?……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拿西方现成的定义来规范我们自己的思想,但是,定义不是真理,只是一种用什么呈现的方式;定义更不是过程,而是在一定语境条件下的补白。拿着现成定义比照现实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忘记了语境的规则和潜规则。

我们再比照一段东方式的阐述方式:“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作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众所周知,这是《周礼·考工记》中开宗明义的一段陈述。《考工记》是中国先秦时期(东周春秋末期)齐国人记录手工生产规程的一部官书,记载了包括当时的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搏埴六大主要手工艺、三十六道工序的丰富记述,因曾收入《周礼·冬官》而被称为《周礼·考工记》。这段记述,虽然只有短短的89个字,但是包含的内容却无比丰富。可以说,其中包括了关于设计理性的追问、关于行为主体的追问、关于传承机制的追问、关于文化属性的追问、关于设计物性的追问、关于设计制度

的追问、关于设计原则的追问、关于设计方法的追问、关于设计批评的追问……在这里,我们并不要分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山高水低,但是很明显,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与话语体系笼罩之下,很难找到与东方的文化经验相匹配的语言与逻辑关系。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的一百余年间,西方现代设计运动此起彼伏,现代主义思潮与方法论相继登场。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的设计思想与方法论的发展,都基本服从于一个主题,即利用设计来刺激和扩大产品的生产和商业销售。而一个个思潮、一种种主张,基本上都是以“人—物”之间“主客体”关系的模式去构建、协调、适应与发展这样的逻辑再延续和更替。设计的发展在西方一个又一个思潮带动下走向与西方工业社会发展轨迹完全相仿的方向。在西方工具理性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技术观直接影响着设计价值观,“人”与“物”的关系被建构成一种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主动与被动、主宰与被主宰的“单边”关系。人对于物质对象、产品对象,只有以技术来规划、控制、加工、利用的关系。可以说,所有的设计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近代理论认识基础之上。

20 世纪末“非物质主义”设计观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的来临。因为“非物质主义设计”主张的基本宗旨,是通过设计观念与设计方法的转变,在不增加物质消耗的前提下提高生活水准,同时从整体上控制和压缩社会生产总量,使得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种种矛盾冲突能够有所缓和。“非物质主义设计”思想的推动者之所以对于东方设计思想、亚洲价值观抱以期望,是因为他们认为东方哲学的源头中便包含着这一思想的萌芽状态。他们特别尊重的老子思想中,便有“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的主张,这即是“非物质主义设计观”最好的理论依据。所以,他们希望“非物质主义”的设计主张应当在老子思想的故乡——中国得到强烈的反响。这是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启示。亚洲传统价值观完全可能与建立在西方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欧洲文明价值观共建现代设计的理想与准则。在人与外部世界、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亚洲有自己的理解与理念。

三

亚洲文化包含着极为细致的情感、极为出色的想象力与不同于西方的文化逻辑,这些构成了亚洲共同的创造精神与设计价值观。在我以往的论文中不止一次提到了日本的“间”的文化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对这个话题初次涉及,与爱知县立艺术大学矶田尚男教授、白木彰教授多次讨论;2003年再次造访日本时,又与千叶大学工学部宫崎清教授深入讨论了这个话题,并在千叶大学研究生课程中就这一论题发表我的见解,得到宫崎先生的强烈认同。

我以为,这是个很好的案例,可以从中发现东方民族的思维对现代设计的启示。“间”是一个涵盖了中、日两个亚洲文化单元的思维方式、文脉传统,并且至今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设计方法。“间”在日本文化中的特殊意义和地位,完全是东方文化传统中主体与对象之间互为主体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的体现。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作为一个现代哲学概念,主要运用于文化传播行为、社会交互行为与教育行为等相关领域的原理性研究,但是我想,在东方设计方法论与价值观的范畴中,它是思考亚洲设计价值观时可以探讨的一个课题。比如,日本的文化根源中,包含着“万物有神”的思想因素,所谓“十万众神”的意识,体现于日本生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日本文化中对于“物”的观念也是这样一种文化意识的流露,这是一种典型的人与物互为主体的关系。正如在“间”的文化中所体现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必须以一种“物”的符号作为见证、作为中介、作为连结,这种关系涉及物、渗透到物、影响到物,便是物的价值的“神格”化、“神圣”化,以至意识形态化。在日本民族对于“物”以及“造物”行为的近乎于敬神一般的崇拜心理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神圣”品格的影响力。

如果超越商业竞争的政策面来看,我以为这就是现代日本设计与日本制造业,乃至日本的产业经济能够立足于当代世界经济竞争的精神后盾与文化依据。这种把物视为一种价值主体的文化观,视为人的精神同体的价值观,进而言之,人的一种开放的、非封闭的物性观,一种互为渗透、互相制约的造物观,一种把一切设计对象、生产对象都视为一种品格主体的物质观,一种具有鲜明东方意识形态特色的造物观,并且,至今仍在一个很深的层面上支配着人的创造行为。这